

关于“汉字统一”的几点思考

华学诚

提 要 本文所说的“汉字统一”,是指现行汉字印刷体的标准化问题;根植于汉语的汉字,历史上不断得到整理并实现统一;服务于汉语的汉字,繁化简化并存而以简化为主;讨论繁简字问题,必须排除论域不具同一性的议题;寻找繁简字统一方案,应该正视问题、加强研究,遵循规律、实事求是;大陆简化汉字是不可替代的统一基础,繁简字的最大公约数是探求统一的方向。

关键词 繁简字 现行汉字 汉字统一

自从大陆实施汉字简化方案之后,关于繁简字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近些年来更是空前热烈,可以说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是非常有益的。非理性的网络言论不必考虑,参与讨论的汉语言文字学专家也好,其他各界朋友也好,态度都是严肃的、认真的,讨论的氛围非常健康。近年来的讨论也渐次深入,几乎涉及到了现行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有些讨论还延展到历史汉字系统。讨论提出了不少主张,比如“以简统繁”、“废简回繁”、“繁简并存”、“取消繁简”,以及“识繁写简”等等。排除非学术的原因,我认为上述主张都有自己的道理,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并进行科学严谨的分析。

我赞成“汉字统一”!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为担心学理上的误解。如果从汉字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看,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汉字是不是统一的问题,繁体字也好,简化字也好,都是汉字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以提出“汉字统一”的问题,实质上是从汉字的现代应用层面(即现代印刷体)而不是从汉字系统的层面提出的,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有的地区用繁体字印刷,有的地区用简化字印刷,甚至同是使用繁体字还有笔形笔画的差异,这就是我所说的需要统一的问题。严格说来,所谓“汉字统一”,实质上是现行汉字标准化的问题。

下面就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现行汉字有没有可能实现统一?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明白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它根植于汉语。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其特点是,形式方面具有节律性,内容方面具有自足性,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就形成了汉语特有的自相似性”。汉语的这些特点“要求表达它的汉字也必须具有自身的节律性与自足性,从而具备与汉语相适应的自相似性。”“可以这样说,只要汉语生生不息,汉字就相伴而行,成为当

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岁文字”。^① 汉语史和汉字史证明上述论断是正确的。

汉字不仅根植于汉语,而且不断适应并契合于汉语,这种适应和契合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整理并实现统一。

汉字整理与统一,史不绝书:传说黄帝史官仓颉造字,其实他就是最早对古代文字作整理统一的人;我们所以能够看到两周钟鼎铭文那样规整,是因为周代史官史籀整理统一成为大篆;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在秦统一之后得到根本改观,是因为李斯主持对西周以来的正体字进行必要的改进之后把汉字的书写系统统一了;程邈开始整理奠定后来楷书基础的隶书,第一部楷书字典——顾野王《玉篇》的编撰宗旨也是为了汉字的规范化;南北朝汉字使用混乱不堪,初唐着手整理规范,其后出现了一系列指导正字写法的“字样”书,终于使楷书体成为汉字书写系统的正宗,“虽然后代时有变化,但总的说来,仍是楷书体”,“字样学出现的又一成果是正字法成了历代文字工作的传统”。^②

现行汉字统一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汉字发展史及其规律中去寻找。

汉字根植于汉语、服务于汉语,并不断契合于汉语,这一根本要求必然带来汉字与汉语的矛盾:为了有效表达,汉语要求汉字音义清晰明确;作为书写符号,人们自然会希望它越简便越好。因此,汉字与汉语的这一基本矛盾成为汉字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决定着汉字的发展方向:繁化简化现象并存,而简化成为主导趋势。这是事实,也是规律。

从字体发展的几大阶段来看,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经过隶变,最后定型于楷书,字体越来越简化,因而越来越好写;从汉字的构形来看,“简化实始于商代,始于甲骨文”,^③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几乎每个字的结构都可以理解和分析,经过隶变则发生了更趋符号化的根本改变,“现代汉字的基本笔画是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④ 隶变之后,简化也没有停止,这就是后来的草书、行书;对于古文字来讲,隶书及其草书、行书,以及最后定型的楷书,就是它的简化字,而且是成系统的简化。

楷书在魏晋出现之后就能见到它的简体字了,以后逐渐增多,这就是与正体字相对的俗字。如同语言中的通语与方言、雅言与俗语的关系类似,“正字和俗字是相辅相成的”,^⑤也是不断转化的,俗字成为正字发展丰富的直接来源。宋代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和影响,书籍中的简体字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此后新的简体字仍然不断出现。可见,汉字简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研究,这项研究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汉字不断简化的史实。这项研究以1986年重新公布的《汉字简化总表》为准,从第一表和第二表中选取了388个字头(含简化偏旁)进行溯源,结果抄录如下:

始见于先秦的49字,占12.63%;始见于秦汉的62字,占15.98%;

① 李圃:《节律性、自足性与自相似性——谈谈汉语的特点与汉字的特点》,原载《中国文字研究》第11辑,本文引自李春晓2010年6月27日转来李先生修改调整后的电子版文稿。

②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陈炜湛:《汉字简化始于甲骨文说》,《语文现代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④ 赵平安:《隶变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版。

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 24 字,占 6.18%;始见于隋唐的 31 字,占 7.99%;

始见于宋(金)的 29 字,占 7.47%;始见于元朝的 72 字,占 18.56%;

始见于明清的 74 字,占 19.09%;始见于民国的 46 字,占 11.86%;

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1956 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 1 字,占 0.26%。^①

如何讨论现行汉字的统一问题?我认为,应该首先要确定逻辑论域,排除问题不具同一性的干扰。

现行汉字要不要统一,能不能统一,如何实现统一,讨论很多,分歧也很大。如何看待这些分歧,以求达成共识?我认为这就涉及到如何开展讨论、如何使讨论置于科学轨道之上的根本问题。“汉字统一”的问题如此重大,出现分歧是很正常的,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就是为了从这些分歧中最终寻求到科学的结论。但是现存分歧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从学术的角度看,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讨论不处于同一个逻辑论域,因此我认为,首先应该排除问题不具同一性的干扰。

第一,“汉字统一”问题是个专业性的学术问题,应该严格限定在学术范围内,由学界进行科学的而非情感的研究与讨论。语言没有阶级性,没有政治性,文字也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语言文字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无论语言问题,还是文字问题,研究和讨论都应该在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学术领域内。带上浓厚情感色彩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比如,简单地要求大陆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就不现实,而简单地要求台湾以及其他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无条件地使用简体字也行不通。

第二,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非汉语使用汉字的问题不应当和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放在一起讨论。无论是从单字看,还是从书写符号系统来看,为汉语服务的汉字,和为日语、朝鲜语等非汉语服务的书写符号系统中的汉字,性质完全不同,把中日韩使用的汉字搅合在一起讨论“汉字统一”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汉字根植于汉语,但是汉字并不是汉语本身,也就是说,汉字问题与汉语问题最为密切,但是汉字问题并不就是汉语问题。中华民族的海内外子孙,只要母语是汉语,在语言交流上就存在需要“语同音、词同义”之类的问题,在文字上则面临需要“书同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很多交叉,但是并不完全同一,因此讨论“汉字统一”应该也必须置于汉字问题的逻辑论域之内。

第四,非汉语通语用字即方言字,也不应该放在汉语通语书写符号系统中来讨论。汉语方言如此复杂,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自身的特点,方言字是与方言词汇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当然方言字也可能被吸收到通用汉字中来,尽管如此,“汉字统一”仍然只能置于记录通语的汉字范围内,不能把方言字搅缠在一起讨论,否则就会影响并干扰“汉字统一”方案的有效寻找。^②

第五,汉字统一只能针对印刷体(包括计算机字库),不可能去统一手写体。任何语言的文字都有手写体,汉字也一样。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的场合

^① 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7 年版。该书后附有《简化字始见时代一览表》。

^② 当然,即使都是通语,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等也存在需要“语同音、词同义”的问题,这方面存在的差异自然会影响到“书同文”,但是毕竟有限,也可控。

所使用的手写体也会不同,所以手写体永远不可能统一,因而与手写相关的问题也不应该纳入“汉字统一”问题的讨论之中。

第六,“汉字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就是繁简字,还应该厘清现代汉语书写系统广义和狭义的不同。作为现代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真正做到“书同文”,就必然要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系统问题,包括字量、字体(新旧字型)、字序、字音、字形(字构)、字义(词义、语素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是广义的书写系统,除了汉字之外,还涉及标点符号、数字、横排竖排等问题。

第七,“汉字统一”需要解决的只是现行汉字系统内很少的一部分问题,并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是繁简字,其实繁体字与简化字是互相对待的概念,其所指范围是特定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繁体字或简化字自身都不是独立自足的汉字系统,换句话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等其他地区,使用的都是同一个汉字系统,其中历史传承而且共同使用的汉字都是该系统中的最主要的部分,有区别的只是该系统中很有限的一部分。

现行汉字怎么才能实现统一?我认为,应该正视问题、加强研究,遵循规律、实事求是。

从汉字的现代应用层面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汉字系统中那很有限的一部分,即简化字和与之相对的繁体字。因此,实现“汉字统一”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繁简统一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知道,简化是汉字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简体字是汉字历史演变的逻辑结果。我们也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很多专家学者都极力提倡使用简体字,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还曾经为此做过积极的推动。抗日战争爆发迫使简体字运动中断,五十年代之后简体字推广工作在大陆得到了延续,1956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公布了《简化字总表》,从而成功推行了简化字。只要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只要客观地承认上述史实,就应该认识到大陆简化字实际上代表了汉字的最新发展,统一繁简字的途径也就显而易见。我认为,实现现行汉字统一的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以大陆简化字为基础,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进,包括恢复少量繁体字,规范笔形笔画笔顺,制订能够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的字量足够的《通用规范汉字总表》,并且明确规定,严格禁止表外类推。

如果上述意见能够成立,那么首先就要对《简化字总表》展开科学研究,把问题先充分揭示出来,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分类进行专题研究,确立普遍接受的原则,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大陆现行简化字饱受诟病的最大问题集中在下述三点,“一对多”简化字(或称“非对称性繁简字”),类推简化字,为简而简的无理据符号代替字。^①

“一对多”简化字中的绝对多数,在表达现代汉语时并没有问题,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是电脑繁简转换带来的麻烦。我认为电脑转换出现的问题不能成为废除“一对多”简化字的理由,因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许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圆满解决。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是为了研究需要,或者其他必须使用繁体字撰写文稿的需要,可以直接运用繁体字输入,这与社会通用规范字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如果因研究或

^① 全部问题当然不止这些,这里只是举例性质。

者工作需要必须使用繁体字,而自己又不能熟练掌握并准确运用,我觉得只能承认自己不称职,这就好比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既不认识又不会写,就指望电脑替你准确转换而绝不可能算作古文字专家是一样的道理。广义的汉字系统,包括历代全部汉字,古文字也不例外,但是现行通用汉字并不是这样性质的系统,因此不能要求它承担所有表达任务,即使全部恢复成繁体字,也一样承担不了这样的任务。当然,我并不认为现有的“一对多”简化字中就不存在值得研究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后确认不合理,就应该减少这些“一对多”简化字,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恢复了“覆”、“囉”等,明确它们不再作为“复”、“罗”等的繁体字处理(“囉”类推作“啰”),明确读“liào”(瞭望)时作“瞭”,不简作“了”,就是很好的处理先例。

类推简化字受到诟病的主要原因是,这类简化字中的一部分破坏了某些偏旁和部件使用的规律性和系统性。首先必须指出,简化类推并不是汉字简化方案的发明,历史上每次重要的汉字整理与统一过程,都有简化类推的现象,隶变可以作为典型例证,很多古文字的偏旁或部件原本并不相同,隶变之后却相同了,例如“敦”、“淳”、“醇”、“鶉”中的“享”与“郭”中的“享”。但是,我仍然认为现行类推简化字有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古代类推简化时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下述思想:汉字不仅仅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系统也不单纯是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个体和汉字系统本身都承载着文化。因此具有现代科学思想的今人,在思考并推行汉字简化时应该尽最大可能不破坏汉字的结构规律和系统,用这样的观念来审查简化字,有些确实需要再行斟酌。比如“虫”是“虺”的本字,作为汉字形符,“虫”的构字能力很强,“蟲”和“虫”音义都不同,把“蟲”简化为“虫”之后,以“虫”作形符的所有汉字的理据就都被改变了。“單”简化为“单”,类推出“阐”、“禅”、“掸”、“蟬”、“嬋”、“弹”、“憚”、“鄣”、“殪”等,“戰”却简化为“战”;“盧”简化为“卢”,类推出“颅”、“沪”、“鲈”、“鲈”、“鲈”、“鸬”、“垆”、“栌”、“钭”等,而另一批以“盧”为声旁的字却又类推成“炉”、“芦”、“庐”、“鲈”、“驴”等,“讓”简化作“让”,“釀”却简化作“酿”,但是“壤”、“壤”、“攘”、“瓢”等又不简化。诸如此类,确实是问题。当然,其中有些类推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比如“勤”,如果按照偏旁类推,左右分别为“又”和“力”,就会和“勸”的简化字“劝”雷同,所以“勤”字无法再简化。但是类推简化存在的问题并不都是有理的,对于无理的类推应该重新逐一审查。回避问题,甚至曲为之说,不是科学的态度。

无理据符号代替字也是受到质疑最多的。符号字自古就有,“在文字画阶段,已经开始用抽象的图形,或者用象征等比较曲折的手段来表意了”,比如“一”、“二”、“三”、“四”的古字;“在文字形成过程刚开始的时候,通常是会有少量流行的记号被吸收成为文字符号的”,比如“五”、“六”、“七”、“八”的古字。^① 汉字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出现记号字、半记号字。^② 以《说文解字》“一”部为例,该部包括部首“一”在内共有五个字,另四个字是“元”、“天”、“丕”、“吏”,但是根据古文字资料分析,后面四个字中“一”的理据和《说文解字》关于“一”的解释并不相同:“元”字上面的“一”是指示头部位置所在;“天”上的“一”是被突出的头形;“丕”和“不”原本就是一个字,有无“一”不构成音义上的区别;古文字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文字形成的过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汉字的性质》。

“使”字的下面是只手,上面是一件器物——可见这些字中的“一”其实已经是没有相同理据的符号了。符号字,或者汉字结构中无法说清楚的符号,是客观存在,而且自古存在。那么为什么简化字中的符号代替字会受到诟病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应该是,人们不能接受把已经定型的有理字改变成无理字,而不是简单地反对符号字或者偏旁部首的符号化。比如简化字中的“鸡”、“凤”、“圣”、“对”、“树”、“邓”、“戏”、“仅”、“难”、“叹”、“汉”、“艰”、“欢”、“观”、“劝”、“轰”、“聂”等,其中的“又”分别替代了以前的不同偏旁;类似的符号还有“文”、“乂”、“丕”等等,都代替了不止一个以前的偏旁。这类符号的替代,唯一的效果就是比原字减少了笔画数,但是符号本身无理据可解,还混淆了原有的字际系统关系。符号代替字还存在自乱其例的现象。比如“溪”、“澄”就不能类推而把右边改成“又”,否则就都成“汉”了,而“嘆”、“燠”右边又没有改成“又”;“仅”的“又”代替了“董”,但是具有相同偏旁的“谨”、“瑾”、“瑾”、“覲”、“瑾”、“廔”、“瑾”等却没有简化;“鄧”简化作“邓”,而“瞪”、“蹬”、“凳”、“澄”等又不简化。

综上所述,我赞成现代汉字印刷体实现统一,统一的方式或者途径是,以大陆简化汉字为基础,展开深入研究,既要遵循汉字发展规律和结构规律,又要照顾全社会的约定俗成,改其必改,改其该改,制订出《通用规范汉字总表》作为用字规范,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同时为日韩等非汉语国家改造改进所用汉字提供参考。

(作者通讯地址:华学诚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